

符号学视角下的四川民间家具装饰艺术研究

杨宇^a, 吕九芳^{a,b*}

(南京林业大学 a.家居与工业设计学院 b.生态文明与林业发展研究院, 南京 210037)

摘要: **目的** 对四川民间家具装饰艺术特征进行符号化解读, 挖掘四川民间艺术、民俗文化的地域特色, 为四川民间文化的创新提供素材, 促进传统家具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方法** 基于莫里斯符号学三分科(符形学、符义学、符用学), 同时结合田野调查、文献研究法, 深入分析四川民间家具材料、色彩、纹样、构图等装饰符号构成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概括其装饰符号形成与发展的语言环境, 进而总结四川民间家具装饰艺术传承的途径。**结论** 四川民间家具在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变革的影响下, 形成就地取材、因材施艺的装饰语言, 体现了四川人民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开放包容的精神风貌。因此, 实现四川民间家具装饰艺术的“守正”与“创新”, 对发扬四川民间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民间家具; 符号学; 四川; 装饰; 纹样

中图分类号: TB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3)24-0457-09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3.24.049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Sichuan Folk Furniture Deco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YANG Yu^a, LYU Jiu-fang^{a,b*}

(a. College of Furnishings and Industrial Design, b. Academy of Ecological and Forestry Studies,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make a symbol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corative art characteristics of Sichuan folk furniture, excavate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ichuan folk art and culture, provide materials for the innovation of Sichuan folk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furniture culture. Based on Morris's Semiotics: Syntactic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combined with field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decorative symbols of Sichuan folk furniture materials, colors, patterns, composition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were analyzed in depth, the context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ecorative symbols was summarized, and then the ways of inheritance of Sichuan folk furniture decorative art was summariz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hysical geography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s, Sichuan folk furniture has formed a decorative language of using local materials and applying technique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and reflects the optimistic attitude towards life and the spirit of openness of Sichuan people. Therefore, achieving the "innovation" of Sichuan folk furniture decoration art during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s"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Sichuan folk culture.

KEY WORDS: folk furniture; semiotics; Sichuan; decoration; pattern

民间家具是由当地木匠制作并供当地民众日常生活所用的一类家具, 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域特色^[1]。四川民间家具历史悠久, 从汉代画像砖《羊尊酒肆》《宴饮》《纳粮》等就可见其早期形象, 发展

到明、清时期则形成了显著的风格特点。历史上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交流, 逐渐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四川自古地势险要, 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特征, 设计制作的民间家

收稿日期: 2023-07-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1YJC760017)

*通信作者

具主要在本地使用和流行，在地域文化的影响下，表现出富有四川民间特色的装饰艺术特征。

1 符号学研究方法

通过检索和分析目前关于四川民间家具的相关文献，发现主要的研究角度包括两个：从宏观角度对其发展、品类、材料、装饰等进行研究；从微观角度对座椅、架子床、神龛等代表性家具的特征进行研究。总体而言，对四川民间家具装饰的专题研究数量较少，缺乏一定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且存在传承与应用不足的情况。因此，借助新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意义活动的学科，现代符号学理论最早由瑞士作家、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提出，符号包括能指与所指、言语与语言、共时与历时、组合与聚合四组二元对立关系^[2]。其中，能指代表了符号的表达层，所指代表了符号的内涵层；共时性反映了符号系统相对静态的组合关系，而历时性则

反映了符号系统动态的、变化的特征。美国哲学家莫里斯（Morris）将符号学分为：符形学、符义学、符用学三门学科，对后来的符号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3]。符形学研究符号之间的关系；符义学研究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符用学研究符号与人的关系，包括了符号使用的语境、目的等。

四川民间家具装饰具有丰富的符号形式和符号内涵，是四川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运用符号学理论能够更为全面地解读其装饰艺术特征和地域文化内涵，为传承发展提供思路。本文所讨论的四川民间家具以清末、民国时期家具为主，并基于对川西古典家具博物馆、建川博物馆、成都大邑刘氏庄园、成都大珍堂等所收藏家具的实地调研与分析。符号学研究路径（如图 1 所示）：从符形角度来看，四川民间家具装饰符号由材料、色彩、纹样、构图等部分构成；从符义角度来看，包括了求福纳吉、生育崇拜、宗教思想、道德教化等方面的意涵；从符用角度来看，符号语境的共时性体现在开放包容的地域文化氛围中，历时性体现在巴蜀木雕技艺的延续发展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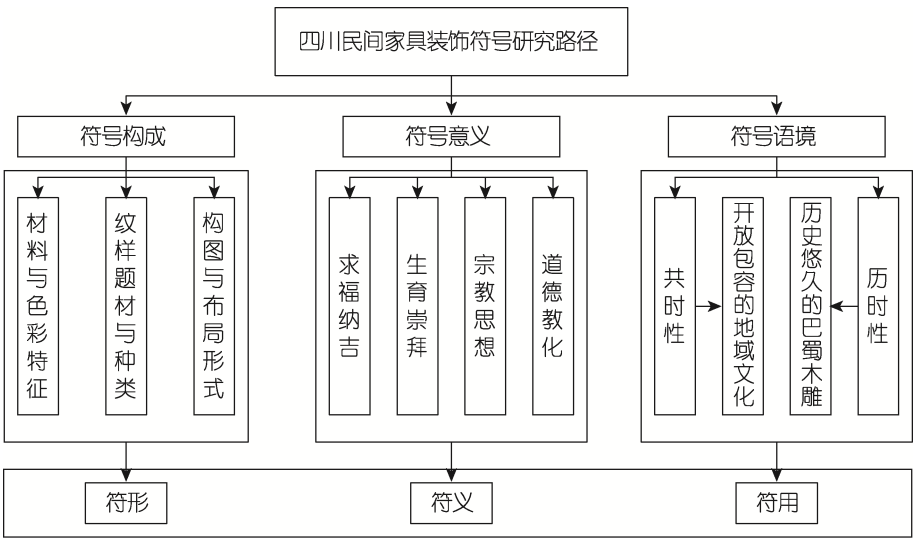


图 1 四川民间家具装饰符号的研究路径
Fig.1 Research path of decorative symbols of Sichuan folk furniture

2 四川民间家具装饰符号的构成

符号的意义通过相应的组合来表达，装饰符号的构成是符号的能指和形体，表现了直观的艺术特征^[4]。四川民间家具装饰符号是表现其民间艺术和民间文化的特殊形式，通过独特的材料与色彩特征、丰富的纹样题材与种类、程式化的构图与布局形式来呈现实用性 与 美观性相结合的生活艺术。

2.1 材料与色彩特征

材料承载了色彩、肌理、形状和量感，不仅有视觉上的信息刺激，还具备触觉上的情感特性^[5]。四川民间家具在选材上注重经济性和实用性，多就地取

材、因材施艺，常用楠木、柏木、杉木、松木、榆木、黄杨木、竹藤材等作为家具的主要用材，并使用石材、金属等作为配饰材料。这些木材虽然不及名贵硬木，但质地细腻，雕刻后纹理自然清晰，使得四川民间家具具备淳朴、厚拙的风格特征。其中，楠木是四川民间家具独具个性的材质符号，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楠木生南方，而黔、蜀山尤多。”明代谢肇淞在《五杂俎》中写道：“楠木生楚蜀者……以暑月做盒，盛生肉经数宿启之，色不变也。”由此可见，四川是楠木的重要产地，楠木材性优良，甚至具有防腐的功效。明、清时期的皇家曾大量采集四川楠木建造宫殿，是当时皇家专用的木材。楠木中的金丝楠木

材质纹理淡雅, 隐约可见金丝, 色泽温和, 是四川民间家具、木雕作品的重要材料。如图 2 所示的建川博物馆所陈列的民国家具就包括: 金丝楠木半圆柜、金

丝楠木平柜、金丝楠木供台、金丝楠木穿衣柜等。因此, 充足的本土木材资源为四川民间家具装饰艺术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图 2 建川博物馆中的金丝楠木家具
Fig.2 Furniture of gold nanmu in Jianchuan Museum

不同的色彩给予人不同的视觉与心理感受, 同时受文化背景、审美取向、生活环境等综合因素的影响^[6]。四川民间家具的色彩一方面来自材质本身, 另一方面则源自历史悠久、发展成熟的传统漆艺^[7]。《蜀都赋》中描述成都: “雕镂铜器, 万技千工, 三参带器, 金银文华, 无一不妙。”可见成都漆艺是四川漆艺的代表, 又称作“卤漆”, 囊括了雕漆、堆漆、嵌漆、彩绘等多种技法, 为四川民间家具的装饰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基础^[8]。根据调研所采集的家具样本, 依照色彩的分布和应用比例, 将其分为主要色彩和局部色彩(如表 1 所示)。座椅是民间使用广泛、使用频率较高的一类家具, 包括灯挂椅、太师椅、圈椅、西式扶手椅等, 其装饰色彩反映了四川民间家具的基本用色偏好。从选取的代表性座椅可以看出, 黑色、红色、棕色等是四川民间家具的主要色彩, 多为素髹单一漆色或使用黑地红漆、红地黑漆的混合髹饰方式。清式家具在审美上倾向于崇尚黑色, 并与红色形成强烈对比, 从而凸显了清代统治者的高贵与权力。这种审美倾向对民间家具审美也产生了深刻影响^[9]。

除此之外, 一些家具如梳妆台、面盆架、拔步床, 其局部色彩则使用红色、绿色、黄色、银色等。将提取的色彩置入 PCCS 图分析得出(如图 3 所示): 家具整体色调集中于浊色、深色和暗色, 偏向古朴、稳重、实用的风格特点; 局部色彩集中于鲜艳、轻柔色调, 更加活力、丰富和生动, 以满足女性群体、婚礼习俗等多样化的审美需求。另外, 纹样线条多应用描金工艺凸显装饰效果, 层次鲜明、画面饱满, 以此彰显使用者的财富和身份地位, 尤其是清代入川经商致富者, 不惜重金修建院落, 定居四川, 其建筑家具无不金碧辉煌。

2.2 纹样题材与种类

纹样是四川民间家具装饰中最丰富、最具创造力的符号形式。明、清时期的四川产生了许多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木雕作品, 尤其是散落在四川各处的会馆、戏楼、民居、寺庙等建筑木雕^[10]。而与之相搭配的家具雕刻也同样风格鲜明, 融合了浮雕、透雕、线雕、圆雕等多种雕刻手法。四川民间家具在雕刻方面,

表 1 四川民间家具的色彩特征
Tab.1 Color characteristics of Sichuan folk furniture

色彩类型	家具及图案						色彩提取
主要色彩							
局部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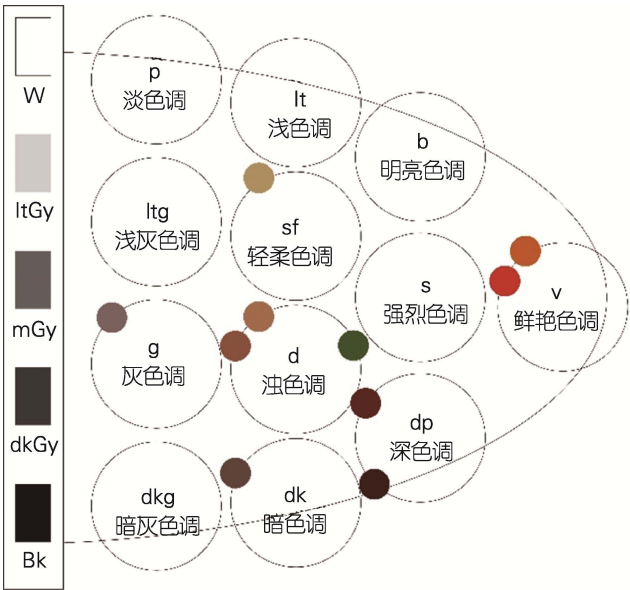


图 3 四川民间家具色彩 PCCS 分析图
Fig.3 PCCS analysis of Sichuan folk furniture colors

多施以浅浮雕、单面透雕、线雕，反映了四川民间追求简朴稚拙的实用精神。一些制作讲究的家具也呈现

出富丽精美的装饰风格，如太师椅、架子床、神龛家具等^[11]。通过对所收集素材的整理和提取，四川民间家具主要的纹样题材与种类见表 2。题材主要包括植物、动物、人物、几何、博古、文字、山水等大量生活化、民俗化的纹样。这些纹样既源自对自然、神灵的崇拜，也包含对民风民俗的记录与表达，体现了四川民间独特的审美情感。

《汉书·地理志》记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天府”环境中生活的四川人民观察自然、利用自然、敬畏自然，将自然之物以纹样符号的形式进行表达，逐渐形成了丰富的纹样种类。其中，动物纹样生动活泼，设计者在纹样造型上通过具象与抽象、联想与想象的方式来营造变化与浪漫的情感，富有民俗趣味。图 4a 中具象符号的蝙蝠纹，注重面部和翅膀线条的刻画，写实或模仿现实世界中蝙蝠的生物习性特征，如斜飞式、倒挂式、俯冲式等，包括表情和善的纳福蝙蝠纹和表情凶恶的驱邪蝙蝠纹；图 4b 中抽象符号的蝙蝠纹则以轮廓代之，注重符号的表达，多装饰于花罩、券口等结构的中心位置，蝠形轮

表 2 纹样题材与种类
Tab.2 Pattern themes and types

纹样题材	纹样符号			纹样种类
植物				瑞花纹、瑞果纹、草叶纹、树形纹
动物				蝙蝠、狮子、喜鹊等自然动物；龙、凤、麒麟等祥瑞动物
人物				戏曲人物、历史典故、神话传说、民俗故事等
几何				回纹、云纹、连珠纹等
博古				瓶、鼎、香炉、酒器等
文字				“寿”字、“吉”字、“喜”字等
山水				山、水、船、建筑、人物等组合的纹样，以景为画面



图 4 蝙蝠纹
Fig.4 Bat patterns

廓内部配以各类花卉纹、祥禽纹、瑞兽纹、人物纹、山水纹,表达吉祥如意。

另外,四川民间雕刻多受到戏曲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丰富的戏曲人物纹样(如图 5 所示)^[12]。川剧剧目号称“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国”。唐代时就有“蜀戏冠天下”的繁荣局面,到了清代川剧逐渐完善并展现出自身风格鲜明的艺术特点,融合了昆腔、高腔、胡琴、弹戏、灯戏五种唱腔,而表演所用的服饰、面具、家具等同样品类繁多,随着社会变化

而逐渐丰富。清代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使得原有的装饰已不能满足民间审美需求,因而戏曲故事赋予了民间家具独特的纹样符号,如《白蛇传》《雪梅教子》《文王访贤》《安安送米》等。这些符号不但折射出四川休闲享乐的精神文化,也传达了民间对戏曲故事中善恶美丑、忠奸贤愚推崇或批判的价值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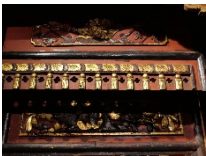
2.3 构图与布局形式

四川民间家具的结构和功能决定了其装饰的构图布局形式,同时受传统审美观的念影响,形成了程式化的装饰手法。纹样根据构图形式分为单独纹样、连续纹样、适合纹样(如表 3 所示)^[13]。家具结构形制变化丰富,因此也留给了创作者较大的发挥空间。单独纹样遵循对称和均衡的构图原则,常作为连续、适合纹样的基本单元。靠背、搭脑、牙条、花罩、门板等处的单独纹样多以对称方式呈现,注重奇偶的数量规律,同时满足了结构和审美的要求。均衡式单独



图 5 戏曲人物纹样
Fig.5 Pattern of characters in opera

表 3 装饰纹样的构图形式
Tab.3 Composition form of decorative patterns

构图类型	纹样图例		特征
单独纹样			对称与非完全对称,保持构图重心
	对称	均衡	
连续纹样			连续、重复排列,具有丰富、饱满的装饰效果
	二方连续	四方连续	
适合纹样			根据结构、轮廓形态设计,具有规整、严谨的装饰效果
	形体适合	角隅适合	
			
		边缘适合	

纹样常见折枝花卉、折枝瓜果,以及不同形态的鱼虫鸟兽,造型上更为灵活自由,展现自然事物的形态美,常见于椅背、结子部位,以及较小的面板部位装饰。连续纹样通过植物、几何等单独纹样进行连续、重复排列,分为二方连续纹和四方连续纹。二方连续纹样包含了接圆式、折线式、波浪式等不同骨式,常用于边缘狭长结构的装饰,如桌椅的束腰和面板部位的边缘就多以二方连续莲瓣纹作装饰。四方连续纹样多以万字纹、菱形纹、锁子纹、龟背纹等作为锦地装饰,衬托主要纹样。适合纹样根据外轮廓的形态进行构图,包括了方形、圆形、多边形等常见的轮廓造型,主要分为形体适合、角隅适合和边缘适合,具有规则化的装饰效果。形体适合以主要纹样填充整个轮廓,与轮廓形态相互融合;角隅适合呈三角形,主要居于方形轮廓四角,以植物、蝙蝠、蝴蝶题材为主;边缘适合依照轮廓形状排列,环绕一周,用作点缀。

此外,家具上的装饰往往根据不同寓意主题进行搭配,形成组合纹样,营造画面感和故事感,从而表

达多样化的符号意义。纹样组合布局常见于面板部位、靠背部位、花罩部位等具有丰富装饰的结构中(如图 6 所示)。这些组合纹样整体遵循对称的原则,将主要纹样居于画面中心,作放大处理,突出主题,其次配以辅助纹样点缀,形成主次分明、画面均衡的装饰效果。

3 四川民间家具装饰符号的意义

符号因意义而存在,意义是符号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14]。家具装饰符号的构成是其能指,意义是所指。能指与所指通过社会约定俗成的方式构建关联。四川民间家具的装饰符号蕴含了四川人民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实践经验、思想文化和民间艺术,充分反映了当地的民风民俗,成为象征地域文化的符号形式。通过对符号构成进行分析后可知,主要涵盖了对求福纳吉、生育崇拜、宗教思想、道德教化的表达(如表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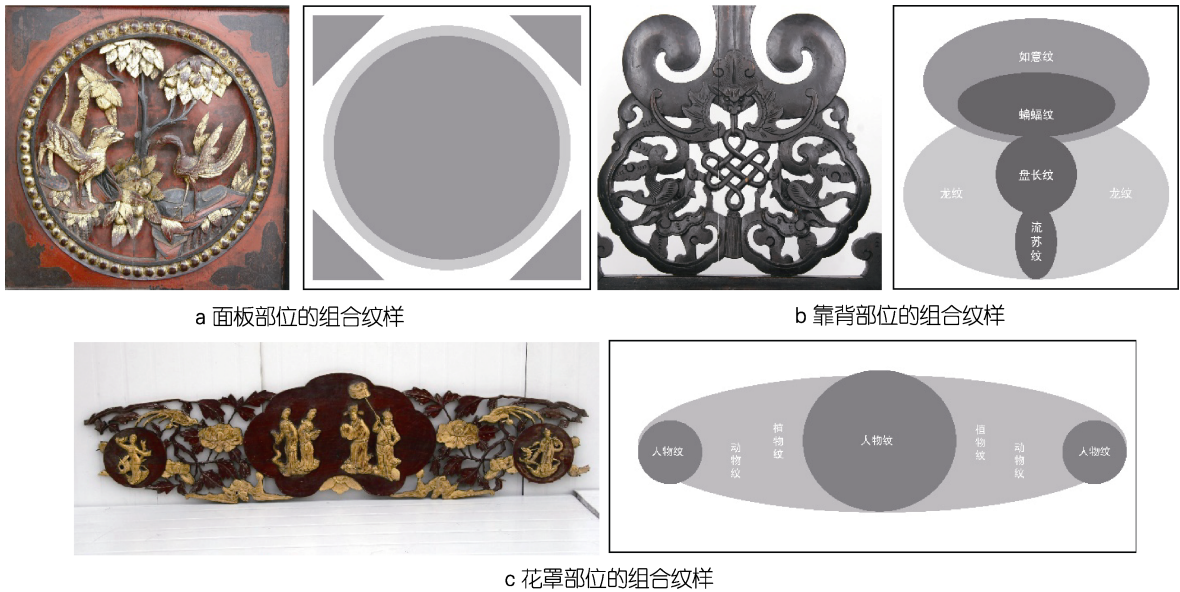


图 6 常见的纹样组合布局
Fig.6 Common pattern combination layout

表 4 四川民间家具装饰符号的意义
Tab.4 Significance of decorative symbols of Sichuan folk furniture

符号意义	能指	所指
求福纳吉	牡丹、莲花、佛手等植物纹样;蝙蝠、喜鹊、鹿等动物纹样;“福”字、“寿”字、盘长等其他纹样	吉祥幸福、延年益寿、驱邪避凶等
生育崇拜	葡萄、石榴、南瓜等单独纹样;瓜蝶、麒麟送子、鱼戏莲等组合纹样;红色、绿色、黄色等鲜明色彩	多子多孙、婚姻幸福、两性繁衍等
宗教思想	明八仙、暗八仙、福禄寿三星等纹样;莲花、狮子、“卍”字等纹样;西番莲、茛苕、几何形等纹样	道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文化
道德教化	梅、兰、竹、菊等植物纹样;雪梅教子、王羲之爱鹅、周敦颐爱莲等人物纹样;博古纹、必定高中、麒麟吐玉书等其他纹样	品格崇高、品德美好、文化教育等

3.1 求福纳吉

清式家具在纹饰上多求吉、求多、求满,最后形成了“纹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装饰习惯^[15],四川的民间家具也受此影响颇深。四川的地方木雕艺术也多在清代发展、兴盛,如成都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崇州廖家木雕,其发源于清代并传承至今。民间家具中大量的植物、动物纹样反映了四川自古以来自然崇拜的风俗习惯,寄托了人们渴求吉祥幸福、延年益寿、驱邪避凶的精神需求。牡丹、莲花、梅花、芙蓉花、佛手、葫芦、松树、灵芝、桃等植物纹样是符号的能指,用来表达祥瑞之意的符号所指。祥禽瑞兽也是福与吉的象征,不仅包括蝙蝠、蝴蝶、喜鹊、狮子、鹤、鹿等自然生物,还包括龙、凤、麒麟等祥瑞生物,通过谐音、假借等多种手法来满足民间求福纳吉的心理,如《尚书·洪范》记载了“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16]家具上不同数量的蝙蝠图案代表了“五福”中的不同层次含义，体现出四川民间追求长寿、财富等世俗化、功利化的价值观。

3.2 生育崇拜

历史上的四川曾多次面临人口锐减的遭遇，蜀汉时期的战争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导致其人口远低于东汉时期，而后宋末元初和明末清初政权更迭、战争不断，四川人口数量进一步走向历史低谷。据统计，从明万历六年到清初，再到乾隆六十一年，四川人口由310万人减至约9万人。因此，身处于如此社会重大变局下，四川人民愈发增强了对生命的珍视和对子孙后代的渴求，生育崇拜思想得到强化与延续，并诉诸纹样符号。民间家具中表达“多子多孙”的符号常见葡萄、石榴、南瓜等单独纹样符号，以及松鼠偷葡萄、瓜蝶、仙姬送子、麒麟送子等组合纹样符号。同时，爱情婚姻也是家具装饰的重要主题，尤其是婚嫁家具、卧房家具在主题和色彩运用上暗示对爱情美好、婚姻幸福的祈求^[17]，将红色作为家具的主要配色，饰以蝶恋花、鱼戏莲、鸳鸯戏水等图案。图7的成都大邑刘氏庄园所陈列的民间婚礼花轿，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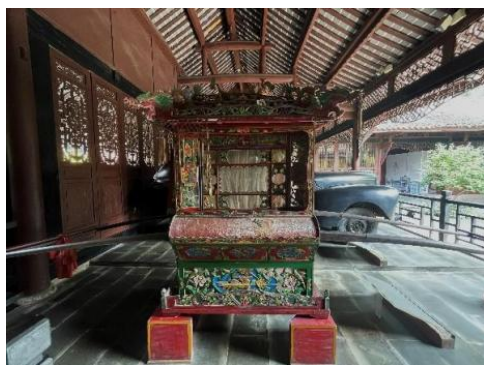


图7 四川民间花轿
Fig.7 Sichuan folk wedding sedan

红为基调，配以绿、黄、蓝等彩绘，轿顶上施以龙纹并配牡丹、葡萄等植物纹样，轿身则用兔、鹿、鸟雀、麒麟，以及各类花卉点缀，含有多重的符号寓意，四川民间对婚俗礼仪、繁衍子嗣的重视可见一斑。

3.3 宗教思想

四川处于多元化的宗教环境中，受道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思想的影响，并结合本土文化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宗教信仰，为民间家具装饰带来了丰富的创作题材。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在四川极具影响力，五斗米道、道教西派等都是创立于四川的道教派别，促进了当地神灵崇拜思想的发展。道教中的神灵是民间艺术主要的创作元素，民间家具以明八仙、暗八仙、福禄寿三星等为主要题材的人物纹样最具代表性，表达驱魔辟邪、渴求长生的愿望。佛教对四川民间风俗的影响同样显著，主要包括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大类型，兴盛时期留下了诸多石窟摩崖造像，如广元千佛崖、安岳卧佛院、盐亭龙门垭摩崖造像等，对四川石雕、木雕艺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佛教中的莲花、卷草、葡萄、狮子、观音、“卍”字等纹样逐渐成为了四川民间家具常见的纹样符号。而清代基督教开始大量入川布道，建立教堂，带来了西洋装饰元素，为大量中西合璧风格、西式风格家具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民国时期的家具西式装饰丰富（如图8所示），西番莲纹、莨苳纹、几何形纹等在家具上广泛应用。同时，这些家具又有明显的中西元素融合特征，也可见蝙蝠纹、“寿”字纹、麒麟纹等中式元素。



图8 西式纹样
Fig.8 Western pattern

3.4 道德教化

中国是礼仪之邦，向来注重行为约束和礼仪规范。四川的文化教育发展源远流长，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贡献。蜀学的兴起和发展为四川注入了重视文学教化的社会风气。再者，家规家训、宗教思想、历史典故等在道德教育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四川民间家具中的纹样多蕴含对个人品质的要求和文学风气的追崇。梅、兰、竹、菊、松被视作坚韧不拔、高风亮节的形象，常组合为“岁寒三友”图（松、竹、梅）和“四君子”图（梅、兰、竹、菊），成为家具使用者身份品格的象征，以及父母对

子女品行的要求。《雪梅教子》《文王访贤》《陶渊明爱菊》《王羲之爱鹅》《周敦颐爱莲》等戏曲故事、历史典故图案,则是对其中人物高尚品质的赞美和颂扬。此外,还有大量装饰的博古纹、必定高中、麒麟吐玉书等反映文人雅志、学有所成、圣贤智慧的纹样图案,充分表达了四川地区对文化教育的推崇和重视。

4 四川民间家具装饰符号的语境

4.1 共时性——开放包容的地域文化

频繁的移民活动、多民族的聚居环境使四川文化具备交流融合、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开放包容的语言环境是四川民间家具装饰符号意义产生和传播的重要因素。据记载,四川历史上经历了8次主要的移民活动。其中,对近代四川地区的人口和文化影响较大的是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潮,由于战争和灾害导致的四川人口骤减,清政府下令将湖广行省的人口迁往四川地区进行开垦发展,从而恢复了四川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此次移民带来了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多地的人口和风俗习惯,形成了“五方杂处”“土客错居”的局面。目前世代居住四川的少数民族就多达14个,这些民族彼此间交流互通,推动了四川文化内部的交流与进步。

一方面,移民活动引入了其他地区的家具制作技艺,如川东家具——巴渝民俗博物馆的宁波古床,彰显了沿海地区家具形制和装饰特征对四川民间家具的影响^[18]。另一方面,伴随移民活动所产生的会馆文化在四川逐渐兴起,会馆成为了移民群体互帮互助、聚集娱乐的场所。会馆建筑的雕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木雕艺术的成就,如清代四川自贡市由陕籍盐商建立的西秦会馆,馆内雕刻有人物故事共127幅,木雕图案数以千计,形成了气势非凡、装饰精美的艺术特色,是川南移民文化的代表^[19]。而成都的洛带古镇作为闽、粤、赣移民后裔聚居形成的客家文化圈,也是“湖广填四川”影响下的地域产物,其内保存着广东会馆、江西会馆、湖广会馆。这些会馆的建立既体现了移民川西群体存在的家乡血脉归属感,也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为川西民俗增添了新的内涵。此外,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在导致人口流动的同时也为四川引入了来自不同各地域的家具风格,例如海派家具、广式家具,促使四川民间家具中西融合风格的流行,尤其是一些梳妆台、穿衣柜设计精美,装饰丰富,进一步提升了四川民间家具装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4.2 历时性——历史悠久的巴蜀木雕

从历史维度来看,四川民间家具装饰艺术根植于历史悠久的巴蜀木雕技艺。不同历史时期的工艺、文化作为“前文本”因素对家具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具有延续性、继承性^[20]。历久弥新的巴蜀木雕技艺为

四川民间家具装饰符号意义的诞生创造了独特的符号载体和语言环境。

从成都金沙遗址中出土的竹筐、木梳、木牍等竹木器具,以及木雕彩绘像可以看出,古蜀人已经掌握了良好的木工技术。“蜀山兀,阿房出。”秦汉时期的巴蜀木工就已经有官民之分,官方木工具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先进的技术水平,并且汉代厚葬之风盛行,墓葬雕刻充分展示了当时的雕刻技术,画像砖中有不少反映当时家具使用的场景。隋唐时期,受佛教文化的影响,统治者大兴石雕,许多佛教石雕造像在巴蜀建成,如成都万佛寺石刻,此时木雕也在石雕的发展下共同进步。到了宋代,石刻艺术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如重庆的大足石刻,就代表了当时佛教石窟艺术的巅峰水平。此外,宋代还出现了建筑学著作《营造法式》,使得建筑结构对家具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而明、清时期经济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使得雕刻的题材和内容愈加丰富,并追求吉祥的装饰寓意。清代的木雕发展到了精致、繁缛、华丽的程度,同时“移民实川”的政策带入了各地的雕刻技艺,为近代四川民间木雕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民国时期受西方文化影响,催生了大量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和家具陈设,如1932年以来建造的成都大邑刘氏庄园,是川西大地主刘文彩所居住的公馆,无论是建筑还是室内配置都兼具中西融合的特色^[21]。由此可见,生产力水平、文化思想等外部语境的变化对巴蜀木雕技艺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5 四川民间家具装饰艺术的传承

四川民间家具装饰艺术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符号,具有审美价值、实用价值。据调研,民间家具主要留藏于各类民间博物馆中,传统的审美艺术被固化在陈列和展示环节,大量陈列的家具缺乏良好的保护和修复措施,存在积灰、破损等问题,其所承载的地域民俗文化也得不到充分传承和发扬。对于四川民间家具装饰艺术的传承,需要做到符号的“形义结合”,既要延续原有的装饰工艺、装饰手法,也要保留和发扬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具体如下。

1) 要做到坚持以人为本。非遗手工艺人不但有其自身对材料、工具、手法、诀窍的理解,也将其自身的观念、意识、情感、趣味等运用于技艺实践之中,形成了具身化的知识形态^[22]。历史上的四川工匠不但曾应征入京从事宫廷雕刻,也在与其他地区工匠的交流中不断创新技艺,通过师徒相传延续,但随着时代变革,也面临失传的窘境。因此,手工艺人自身的技艺和精神需要得到更好的保护与继承。

2) 民间家具根植于乡土环境、民俗文化。乡村拥有丰富的农业产业和文化资源,发掘乡村优势能够助推符号的应用^[23]。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可充分利用四川独有的乡村旅游模式谋发展,林盘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通过将四川民间家具装饰艺术与林盘建设结合,对林盘民居、室内陈设进行设计,实现符号的应用,从而传承和彰显四川民间家具文化特色。

3)四川民间家具文化具有包容的内涵。符号的应用不应只停留在原有载体形式,人们的观念、审美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改变,继承不仅应做到“守正”,也应该做到“创新”,实现家具构成的形式创新、色彩创新、肌理创新、装饰图案创新、材料创新,以及结构工艺创新,从而符合现代审美需求和使用需求^[24]。

6 结语

民间家具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具有实用性、美观性的功能和价值,反映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审美观念。四川民间家具是四川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巴蜀自然人文环境,体现了四川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对四川民间家具装饰符号的解读,是对四川文化的挖掘和继承,促进了符号学与地域文化的联系、沟通。在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的社会语境下,传承和创新成为重要的文化发展主题,四川民间家具作为地域性家具的宝贵遗产,将在未来的设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参考文献:

- [1] 闫丹婷. 渝东南土家族民间家具审美特征分析[J]. 装饰, 2012(1): 137-138.
YAN Dan-ting. Analysis on Tujiazu Folk Furniture Aesthetic Features[J]. Art & Design, 2012(1): 137-138.
- [2] 肖娅曼, 应燕平. 索绪尔与博杜恩语言学思想比较研究[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4): 102-111.
XIAO Ya-man, YING Yan-ping.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Linguistic Thoughts of Saussure and Baudouin[J].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1(4): 102-111.
- [3] 赵毅衡, 罗贝贝. 艺术意义中的三维配置: 符形、符义、符用[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4): 85-97.
ZHAO Yi-heng, LUO Bei-bei. Three Dimensional Configuration in Artistic Meaning: Syntactic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J]. Journa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2(4): 85-97.
- [4] 贾祺悦, 李毓菲, 卞梦晨, 等. 符号学视角下的闽东民居装饰艺术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2, 29(1): 111-115.
JIA Qi-yue, LI Yu-fei, BIAN Meng-chen, et al. Study on the Decorative Art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Eastern Fuji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J]. Furniture & Interior Design, 2022, 29(1): 111-115.
- [5] 刘晓英. 文化视野下的武汉“城市名片”导视系统设计研究[J]. 包装工程, 2020, 41(10): 300-305.
LIU Xiao-ying. Design of Wuhan's "Name Card" Guiding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0, 41(10): 300-305.
- [6] 吴天宇, 赵祎乾, 李亚军, 等. 基于用户需求分类的产品色彩情感体验设计[J]. 包装工程, 2022, 43(16): 209-217.
WU Tian-yu, ZHAO Yi-qian, LI Ya-jun, et al. Emotional Experience Design of Product Color in User Needs Classificatio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2, 43(16): 209-217.
- [7] 吕光. 传承视角下朝鲜族传统家具的数据库呈现与创新设计[J]. 包装工程, 2023, 44(2): 385-395.
LYU Guang. Database Presentation and Innovative Design of Korean Traditional Furni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heritance[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3, 44(2): 385-395.
- [8] 吕建华, 陈铭. 川西民间家具装饰特征研究[J]. 包装工程, 2011, 32(20): 101-104.
LYU Jian-hua, CHEN Ming. Study on the Decoration Features of Sichuan Western Folk Furniture[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1, 32(20): 101-104.
- [9] 李瑞益, 郭晶. 成都春熙坊清代古典家具装饰与文化探析[J]. 包装工程, 2023, 44(6): 328-335.
LI Rui-yi, GUO Jing. Analysis on the Decorative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ical Furni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in Chengdu Chunxifang[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3, 44(6): 328-335.
- [10] 李祥林. 戏台·会馆·移民文化[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16(1): 114-118.
LI Xiang-lin. Opera Stage, Guild Hall and Immigrant Culture[J]. Journa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14, 16(1): 114-118.
- [11] 胡虹, 红尘. 巴渝神龛家具的传承与特征研究[J]. 装饰, 2008(9): 122-124.
HU Hong, HONG Chen. Studying the Heritage and Feature of Shrine Furniture in Bayu[J]. Art & Design, 2008(9): 122-124.
- [12] 李文洁, 何光涛. 四川戏曲雕塑的历史、分类及特点[J]. 民族艺术研究, 2015, 28(3): 143-149.
LI Wen-jie; HE Guang-tao. The History, Category and Features of Sichuan Opera Sculptures[J]. Ethnic Art Studies, 2015, 28(3): 143-149.
- [13] 钱娟, 信晓瑜, 肖爱民, 等. 柯尔克孜族传统纺织品图案基元解析及应用[J]. 丝绸, 2021, 58(3): 127-133.
QIAN Juan, XIN Xiao-yu, XIAO Ai-min.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Kirgiz Textile Patterns[J]. Journal of Silk, 2021, 58(3): 127-133.
- [14] 彭佳. 从符号与意义的关系出发讨论符号[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2): 41-46.
PENG Jia. On Signs: From the Relations between Signs and Meanings[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6(2): 41-46.
- [15] 戴向东, 王铁球, 钱亚琴, 等. 明清家具艺术在近代的断流考析[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21(2): 49-53.
DAI Xiang-dong, WANG Tie-qiu, QIAN Ya-qin, et al.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ruption of Ming and Qing Furniture Art in Modern Times[J]. Journal of Nanjing Arts Institute (Fine Arts & Design), 2021(2): 49-53.

(下转第491页)